

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重温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 骆 乾

为了解决新时期繁荣发展文艺事业问题，1979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要任务、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如何发展及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等问题，是一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文献。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要任务

在大会祝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此出发，他认为这一重要课题给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艰巨任务。

第一，同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斗争。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结束后，“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在这个过程中，“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各种妨碍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具体而言，“批判剥削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道德风尚”。

第二，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邓小平认为，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天地十分广阔”。首先，要按照文艺属于人民的原则，在创作中充分表现

我国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其次，文艺要“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再次，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最后，积极创造给人以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作品，认真反映英雄人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在大会祝词中，邓小平不仅指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要任务，而且就文艺工作者如何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提出了努力方向，成为新时期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工作的重要遵循。

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邓小平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因此在艺术上要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与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密切配合，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强大的舆论，引导人民提高政治觉悟，认识到腐蚀人们灵魂、毒化社会空气等错误思想的危害和实质，以“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文艺工作者要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源泉。邓小平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更需要人民”。艺术如果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会枯竭。因此，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特别指出：“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只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就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党如何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邓小平指出，要使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完成上述任务，使文艺工作者完成神圣使命，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

在基本原则，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在领导机制上，“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邓小平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从各个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党的领导者要抛弃衙门作风，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要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要以自己的创作成果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前进；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要横加干涉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

在人才培养上，“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邓小平认为，当前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迫切要求极不适应，“我们不仅要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他指出，老一代文艺工作者要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起重要责任，“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2016年11月，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在此情形下，重温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这篇祝词，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重读经典

治学之道

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年间。所著《颜氏家训》是其结合自身经历撰写的一部国学经典，开后世家训先河，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勤于读书，善于治学，其读书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梳理《颜氏家训·勉学》篇的文本内容，概括其读书治学之道主要为八个字：勤笃、切磋、博学、务实。这八个字的读书要诀，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勤 笃

勤笃意指勤奋专一，持之以恒。颜氏主张读书治学首要勤学苦练，且学贵有恒。通过刻苦读书、勤学不辍，才能多知明达、涵养身心、行道利世。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业精于勤，自古以来的贤圣帝王都需要勤奋学习，何况一般老百姓呢！作为普通大众更要勤奋刻苦。勤奋学习，最好从幼年开始，这是读书的最好时机。如颜氏所言“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因为幼时读书，精神专一而敏锐，记忆力旺盛，所学知识不容易遗忘。《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谈及“魏武”（即曹操）“袁遗”（即三国袁绍从兄，字伯业）二人，他们之所以有所成就，赖于他们从幼时就开始勤奋读书，直到老年仍一直坚持，没有荒废。错过幼时读书的最好时机，也不要自暴自弃，“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失于盛时，犹当晚学”，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且老而弥笃。

做到勤奋专一，持之以恒，往往

颜之推读书治学之要诀

□ 王晓兵

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如梁元帝12岁，便已好学，时患痔疮，手足不能伸屈自如，在空斋里支起一帷帐防蝇，独自坐在帐内读书，病痛时饮酒镇痛，每天坚持读史二十卷，从不厌倦。再如战国苏秦以锥刺股，发愤读书；西汉倪宽带经而勤，路温舒牧羊编写简书；晋代车胤家贫聚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等，他们都是刻苦磨砺、意志坚定、勤奋好学的范例。

切 磋

切磋意指好问则裕，切磋起明。颜氏认为读书治学要好问多问，多向人请教，经过互相切磋交流，才会互相起明。

学与问二者相辅相成。古人主张学问好问，虚怀若谷，多与人切磋，才能增广学识，言行有得。如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孟子提“学问之道”，“学”之后要紧接着“问”；颜氏引用《尚书》的“好问则裕”，以及《礼记》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都强调向人请教，多与他人切磋，唯有如此，才能互相启发，引出明达的见解，从而不断提升自我。

勤学而不好问，非真好学者。闭门读死书，只会狭隘闭塞，见识浅薄，往往难有进步，因此切忌自以为是，孤芳自赏。颜氏曾亲历他人闭门读书，自以为足，是大庭广众之时，则错误讹漏频出。

好问但不要盲从，不可偏信一隅。颜氏认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读书治学“必须眼学，勿信耳受”，道听途说不可取。尚未经过亲身实践查证或调查研究，就随便引用别

人转述的言论，这样不但不会彰显自己的学识，反而会暴露自己的陋拙，同时对自己也会造成误导，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害人害己。

博 学

博学意指博涉为贵，博览机要。颜氏主张博览群书，不仅要熟读经典，还要广读百家之书，兼收并蓄；同时强调要博览机要，阅读书中的精要之处，明晓精义。

《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指出：“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颜氏主张博涉为贵，认为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只要博学求之，都会对事情有利的。他强调“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要“涉百家之书”。要读《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包含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学问，通过阅读，自然能开启心智，增益德行，但还要涉猎百家之书，读关于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之书，另外如郡国山川，官位氏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等，皆要根寻，得其原本。这样才能做到“学备古今，才兼文武”，纵使不能增益德行，不能敦厉风俗，也还能作为一种技艺，“得以自资”。

“光阴可惜，譬如逝水”，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阅读“六经”“百家”时，应当博览机要，“明六经之旨”，领会“百家”之要。要掌握关键要领，抓住书中的精粹切要，吃透书中的精华要义，既做到博览群书，又能

阅读精要，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如此，则“必能兼美”。

务 实

务实意指知行合一，学以致用。颜氏强调读书治学要注重实用性，要“有益于物”，反对高谈阔论，不切实际。

读书治学要做到知行合一。要“思欲效之”“利于行耳”，力戒“但能言之，不能行之”的弊病。读书治学要用于生活实践，向圣贤学习，进而效之行之。如，不知养亲者，通过读书观古人“先意承言”，即“起而行之”；未知为官者，观古人守职尽责，则“思欲效之”；向来骄奢者，观人之恭俭节约、谦卑养德，则敛容抑气；素来吝啬者，看到别人重义轻财、周济穷困，于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平素暴悍者，观人之小心克己，则含垢藏疾，尊敬他人；怯懦者，观人之达观委命、强毅正直，则勃然奋力，不可慑服。

针对魏晋时期士大夫多手持尘尾，不谈世事，崇尚清谈之风，颜氏提出读书治学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反对纸上谈兵。他引用邛下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借博士买驴，云天雾地、洋洋洒洒地写了三页纸契约，还未见一个驴字，讽刺这种高谈阔论、一无是处的做法。他还批判那种空守章句，不务实际的行为，如对经书中的“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两张纸的疏理文章来解释，有何意义呢？那些俗儒整日埋首章句，拘于经纬义疏，即使满腹经纶，也毫无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谢明干同志著作《艰难与辉煌——谢明干改革发展文选》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谢明干同志向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奉献的礼物，也是他多年以来从事研究工作的结晶。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既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也为有志者成就美丽人生提供了广大舞台。谢明干同志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60年，特别是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奋发进取、顽强拼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书写着人生美好的篇章。

谢明干同志无论在履职之际，还是在退休以后，一直钟情翰墨，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各类文章和研究成果。几十年来，曾在报刊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各类文章500多篇，在国内作过有关经济改革发展的报告或发言400多次，还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作过多次专题演讲，出版了20多部经济方面的著作。这次收录书中的文章有200多篇。其中，从文章内容看，既有论述改革开放，又有阐述经济发展；既有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又有探讨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问题；既有城市建设研究，又有环境和人口分析；既有观察港澳经济，又有纵论国际经济。从文章种类看，既有理论研究、学术探讨，又有政策分析和咨询建议，

图书评介

寻求社会治理变革的杠杆

□ 孔繁斌

自人类进入后工业化进程以来，伴随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社会治理的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显现，治理变革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然而，从哪里开启治理变革的道路，从何处撕开治理变革的口子，以此来撬动整个治理体系从旧的模式迈向新的格局？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变革策略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有关变革逻辑的理论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郁建兴等著《“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中国方案》一书，为我们探索未来的治理变革理论与实践、探寻治理变革的战略与策略提供了一个成熟的典型案例和绝佳的分析样本。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省的源起、发展与成果，描绘了这一浙江经验向全国范围的政策扩散图景，同时努力探寻这一成功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深层逻辑与治理理论。就社会治理的变革而言，“最多跑一次”改革至少发挥了三个方面的杠杆作用：以群众感受撬动政府自身变革，以局部改革撬动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变革，通过“以民众为中心”的理念撬动治理变革的逻辑转型。

显然，“最多跑一次”改革所涉及的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或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仅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小部分，但这个部分却是民众感受政府服务供给以及体验社会治理最为直接的部分，是关系到民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最典型的部分，选择这个领域作为治理变革的突破口就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它不仅撬动自身变革，同时对整个治理体系的变革都发挥了杠杆作用。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看，治理



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各治理主体、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因此，政府自身的变革仅仅是治理变革这项系统工程中的一个环节，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键环节，但其他要素的变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最多跑一次”改革也促使人们在理论层面上重新思考社会治理与治理变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所反映出的就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界面及其后台运行上的重构，是普通社会大众与专业政府部门在大众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重新匹配，它呼吁我们在谋划治理变革时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寻求一种新的逻辑。“最多跑一次”改革所蕴含的“以民众为中心”的理念表明，社会治理及其变革的逻辑转型应当从传统的服务供求关系转向平等协作关系、从传统的行政效率观转向民众获得感、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公共服务供给转向民众与政府共同谋划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创造公共价值转向民众创造公共价值。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功范例所抽象出的这些理论与观念将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独特的思想启示，将为我们进一步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治理理论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